

一、学科总论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述略

中国现代史（这里指的是 1919 年至 1949 年这段历史），一般认为还是一门尚未建成完整科学体系的学科。40 年来，对它的研究与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坎坷历程同样，经过了建国初期的兴起，“文化大革命”中的挫折，和新时期的恢复发展几个阶段。

一、建国初期研究工作的兴起

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创建了人民国家的条件下着手进行的。建国伊始，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是党怎样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因此，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力也自然集中到革命史方面。1949 年至 1966 年，国内出版了党

史、革命史小册子 100 多本，革命回忆录数百种，有价值的论文资料 2000 多篇。这一阶段的研究情况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对中国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情景的回顾，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回忆录，为现代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以革命回忆录来说，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大量出版；以武装斗争为内容的回忆录，特别是“八一”建军至全国解放这一时期，还先后汇编成《星火燎原》10 卷和《解放战争回忆录》。其他选材较广泛的回忆录与专辑有《红旗飘飘》16 册和多本的《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丛书》；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回忆录，有涉及重大政治运动的，也有涉及某些具体事件的如五四、五卅、一二九、二七罢工、香港海员罢工、中山舰事件、广州起义等均有专书出版或单篇回忆发表；以地区革命斗争为中心的回忆录，北京、上海、天津大城市有，老根据地江西、湖南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西、新疆等自治区都有；以革命烈士和其他人物为中心的回忆录，无论全国或各省有关革命人物的回忆录合辑，或回忆录的个人专集也均出版不少。已出版的回忆录限于当时的条件，有某些史实尚待进一步核实，但毕竟为后来进行搜集资料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回忆录体裁近似的历史记述尚有工厂史。50 年代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编写厂史的活动。工厂史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旧社会所受的残酷压榨，记述了他们英勇斗争的史迹。质量较好的即达 20 多种。其中有记述一个厂矿历史的全过程，如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编写的《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门头沟煤矿史稿》，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清河制呢厂的五十年》等。有反映工厂一个时期的历史的如《红色安源》、《1925 年的风暴》（天津棉纺三厂史）等。编者根据厂矿的特点，选择最有意义、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组织工人进行回忆写成散文、特写汇编成册。与此同时撰写

农民、学生、妇女斗争的史书也有多种出版。

其二，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讨论，对现代史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就各时期来说，对五四时期的问题讨论较多。涉及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领导权、性质乃至五四运动的断限，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等问题。在讨论中多重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具体分析则显得薄弱；重视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吴虞、蔡元培的具体分析则不够，就是对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研究范围也比较狭窄。对某些当时起过作用的人物，由于种种原因，亦未能涉及。

就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来说，对统一战线问题做了一定的讨论。其中主要讨论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问题，而对统一战线中尚有“统一”的方面不太注意研究，有的还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理解为“自搞一套”。另外讨论到对待资产阶级的中间路线时，也比较重视揭露中间路线的反动本质，往往忽略对中间路线形成的具体考察和所起作用的历史分析。

就革命群众运动来说，讨论工人运动史的问题为多。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标准及时间，曾经引起中国现代史研究者颇大的注意。当时学术界重视阐明工人阶级“特出的优点”而回避讨论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弱点”。有的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自为阶级。这种拔高的提法导致混淆了工人阶级的自发觉醒与真正的阶级觉悟的区别，即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的区别，忽视了党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

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讨论涉及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问题，一般是理论的探讨，没有涉及某个具体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

就人物评价来说，讨论曾涉及到对陈独秀的评价，着眼点集中

于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其错误有的认为是领导权问题,有的认为是“二次革命论”,还有的认为是对农民的错误分析。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导源,或以为是认识问题,或以为是世界观问题。

所有这些讨论,多少活跃了学术的空气,有利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

其三,一些专著和论文的问世,现代史教学体系的提出。

在著述方面,较早影响较大的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和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前者是作者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等院校革命史讲义,195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者是在作者建国初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50年)一书基础上改写和增订的,1958年出版,曾为大、中学校和机关的政治课提供了重要参考。1956年高教部委托李新等编写一套《中国现代史》。1959年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为名开始出版,这是动员了全国有关方面力量集体编写的第一本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当时“尽可能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力图在革命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希望能较为全面地阐明这一历史时期中的重要问题”^①。但因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该书在内容上仍然不能不带有革命史的特点,而且留下了当时难予填补的空白。尽管如此,此书仍不失为当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大科研成果,它的内容和风格长期对中国革命史、现代史的教材发生影响。

在论文方面,这一时期也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论述政治的有李维汉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黎澍的《论五四运动》,丁守和等《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齐武的《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魏宏运的《北伐时工农大军在解放两湖及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江西战争中的作用》等；论述经济的有许涤新的《关于旧中国的垄断资本主义》，黄逸峰的《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论述文化思想的有黎澍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孙思白的《试论五四文化革命的分期及其前后期的转变》；论述人物的有李龙牧的《李大钊同志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彭明的《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这些论文对问题的分析都有一定的见地，有的还有比较大的影响，颇具代表性。

随着中国现代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进展，50年代中初步的教学体系开始提出。1956年高等教学部门组织编辑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自然未尽完善，但毕竟第一次拟订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设计了课程结构和教学章节。其后不久，政治生活出现了紧张因素，连续不断的批判运动在学术界包括在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者中展开，虽然触及到一些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却也伤害了一些学者。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禁区愈来愈多，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繁荣和教学工作的深入。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工作的挫折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伪史泛滥，中国现代史实际上处于被“取消”、被“砸烂”的地位。他们居心叵测地炮制了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除了“突出主席”外，就是突出林彪和“四人帮”自己。中国现代史根本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和进展，有的只是歪曲、篡改和对研究工作的破坏。

林彪“四人帮”从“突出领袖”出发，极力抹煞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实他们突出毛泽东是假而突出自己是真。他们为了突出自己，对大量历史事实进行了编造。例如，在南昌起义时林彪不过在马回岭任见习排长，却被吹捧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并胡说什么林彪“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和毛泽东在井冈山

胜利会师。抗日战争中，1938年3月林彪在山西大宁午城镇附近看地形时被阎锡山的军队打伤，却说成是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制定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决策时，林彪并不在场，正在从延安至山东途中。他是在毛主席、党中央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后中途折向东北的，在建立东北局的时候他还未出关。当时却把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功劳统统挂在林彪帐上。另外，“四人帮”吹捧江青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在完全否定30年代文艺的同时对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也一笔抹煞。类此不胜枚举。

林彪“四人帮”还动辄因人改史，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被弄得面目全非。对于五四运动，“四人帮”曾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幌子，虚构反儒必定尊法、尊儒必定反法的图式，肆意歪曲五四运动的历史。“四人帮”为了把李大钊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竟然诬蔑“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所谓“资产阶级内部的争论”。对于安源罢工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刘少奇、李立三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于是安源罢工的胜利就被说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以“工贼”刘少奇、“老机会主义分子”李立三反对罢工、破坏罢工的错误路线而取得的，从而把一场有勇有谋、团结致胜的罢工运动，虚构成了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对于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四人帮”也肆意攻击，谩骂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牛鬼蛇神”。对于古田会议，则被说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朱德、陈毅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召开的，这个决议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天才结晶。他们之所以这样编造是为了反对朱德、陈毅。对于长征，“四人帮”更是猖狂地反对，胡说什么“小小的长征”，反对发表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和长征回忆录。对于百团大战，“七大”时曾作过较全面的总结。1959年庐山会议后，百团大战就在史书和陈列中消失了。“文革”中又被作为彭德怀的罪状提了出来。对于“和平民主新阶段”，林彪一伙利用刘少奇被剥夺发言权的情况，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蓄意陷

害。那个被称为“理论家”的“顾问”说：“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后，害怕革命，提出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刘少奇从来没有提出过与中央相违背的自己的路线，更没有制定过什么投降主义路线。对于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四人帮”也挖空心思进行种种歪曲。江青在公开场合就曾颠倒黑白诬蔑闻一多，并说1946年12月北京沈崇事件受害人是“吉普女郎”，这与当时反动派的恶毒攻击完全没有两样。

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统治下，歪曲、篡改、曲解中国革命史、现代史的文章可以任意发表，颠倒史实的中国现代史小册子（或丛书）纷纷抛出，而揭示历史真相的著述却完全被禁止，稍有触及林彪、“四人帮”疮疤的，即有被杀、关、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革命家、史学工作者和革命群众，仍冒着生命的危险，坚持阐明自己的观点，揭示历史的真实，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三中全会以来研究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原有的研究机关、教学机构和专业刊物不但纷纷恢复，而且得到进一步增加和扩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发表了学术论文近万篇；革命史、现代史教材上百册；专题著作和资料达500本。这一时期的革命史研究工作有了显著的开展。比较有份量的著作有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李新、孙思白等主编的《民国史》，魏宏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元起和李光一分别主编的三本同名的《中国现代史》著作，以及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等。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有了显著的开展。

首先，史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得到了恢复。历史科学是通过对历史进程的研究和总结，从而加强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未来世界的预测，由此作出科学的行动选择，更加自觉地创造历史。现代史研究更是如此。但在一定条件下，现代史甚至成为一种凝固的僵化的死板模式，在“文革”期间更变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有了普遍的明确的认识，现代史作为历史科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才得到恢复。

几年来，对若干历史问题澄清了是非，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主要有：

（一）对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和建党时期应有的历史地位重新肯定。肯定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们在创建共产党和开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树有重要功绩。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作用的重新评价。研究者把胡适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学术活动加以区别，把他所标榜的科学方法与具体学术成果加以区别，肯定了他倡导文学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宣传实用主义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三）彭湃在农民运动中的地位如实肯定。

（四）对李立三、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重新肯定。李立三、刘少奇是安源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李立三担任罢工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对安源工运都起了卓越的作用。

（五）对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的形成过程如实说明。古田会议决议并不是毛泽东对以陈毅等为代表的所谓“错误路线”斗争的结果，而决议恰是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所草拟。“中央九月来信”即是周恩来根据陈毅报告及在陈毅参加下写成的。

（六）对瞿秋白作为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革命烈士的历史地位的恢复。

(七)30年代“两个口号”的再研究。否定了“国防文学”是“汉奸文学”、“卖国文学”的错误论断，恢复了这场争论是革命阵营内部争论的本来面目。

(八)否定了陈独秀在“九一八”以后成为汉奸的说法。

(九)百团大战中彭德怀的历史地位重新肯定。百团大战在一个时期被说成是彭德怀“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一种罪行。事实说明百团大战始终是在党中央的关怀、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的，应该予以肯定。

(十)解放战争中“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辩正和刘少奇在整个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恢复。“和平民主新阶段”是由刘少奇1946年2月1日于延安干部会上作《时局问题的报告》时提出的，但它不是刘少奇的个人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战略问题，刘少奇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亦得到了恢复。

(十一)民主党派和若干民主人士历史地位的肯定。

所有这些研究，有些比较深入，有的则还是初步的，但都说明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史的特点和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二，学术讨论的活跃和信息交流的加强。三中全会后，中国革命史、现代史的学术讨论会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较重要的会议，曾举行了上百次。会议上，学者专家聚集一堂，热烈讨论，信息交流大大加强。

在学术讨论方面，诸如纪念历史事件五四、党的成立、二七、国民党“一大”、五卅、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九一八事变、长征、遵义会议、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抗战、抗战胜利等纪念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彭德怀、杨匏安、廖仲恺的诞辰等纪念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华中抗日根据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创，都举行了规模不等的讨论会，发表

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

近年来学术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举其要者，五四和大革命时期的有：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五四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对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的估价问题；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完成的时间和标志问题；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否存在；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中共“四大”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否存在及其形成的标志；大革命时期武汉政府的性质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毛泽东与立三机会主义错误的关系；富田事变的经过和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过程、起始、标志和政策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形成的时间和标志；《多余的话》的评价；西路军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平型关战役的评价；对抗战初期长江局的评价；百团大战的评价；延安大生产的原因、时间、方针和意义；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史迪威事件的原因；如何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评价苏联出兵东北；抗日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的有：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马歇尔使华期间的中美关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特点。

至于信息交流也空前活跃。近十年来，与中国革命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团体纷纷成立，有全国和地方的中国现代史学会、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民国史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有各革命根据地史的地区研究会，还有蔡元培、李大钊、三等人物研究会，并不断召开学术讨论会。专业性刊物也大量涌现，除历史悠久的《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史学月刊》恢复出版外，1979年后《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前身为《党史研究》、《革命史资料》前身为《党史资料丛刊》、《民国史研究》、《历史档案》、《历史与档案》、《民

国档案》等陆续创刊，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总工会、省工会、青年团、省团委、全国妇联、省妇联差不多都设有党史、群众运动史研究机关，亦有刊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激增。国际文化交流空前发展，革命史研究者也不断出国访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我们也举行诸如抗日战争根据地、孙中山、《西行漫记》发表 50 周年等国际学术讨论会。国际信息工具日益增多，《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情报》、《党史信息》、《党史文摘》、《中共党史通讯》等更成为直接传达学术信息的重要工具，一些总结性的研究情况综述文章、不同类型的目录索引也出版了不少。

第三，研究领域和课题大为扩展。在新开领域方面：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长期以来苏联史学界大都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西方史学界又大多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近些年我国史学界对此进行了较为实事求是的研究，着重研究了有关会议、事件和有关人物的活动情况，又研究了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以及它与中国革命建立关系的历史条件。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分析“这个时期中国各阶级、政党、团体、代表人物的主要政治理论、主张和他们之间的争论与斗争，以及这些理论主张的提出、发展和结果”^①。几年来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

（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民主党派史。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研究，基本上限于论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消极性和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很少从民主党派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估计它们的作用。现在伴随着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促进了这一课题的开拓。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国共关系史、统一战线史也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林茂生：《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四) 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汪伪政权的专题研究。此中对东北军阀张作霖、西南军阀、国民党新军阀、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汪精卫政权始末都有了研究的成果。中国革命史主要对立面研究清楚,有助于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研究和总结。

(五) 对各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专题研究。过去主要局限于井冈山个别根据地,现在川陕、鄂赣皖、湘赣、左右江等重要根据地都成为研究的课题。

(六) 对各种现代历史人物的专题研究。过去对现代历史人物研究范围较窄,现在不仅有革命人物,也有一般人物,甚至反动人物,不只政治人物、文化人物,经济人物也开始有人研究。像沈玄庐、虞洽卿、邓演达、冯玉祥、杨杏佛、詹大悲、孔祥熙、汪精卫等,已有人为他们写出传记或专著。

除了上述新开拓或部分开拓的领域外,还有的领域过去已有基础而近年继续进行研究并取得明显成果,亦可举出以下课题:诸如,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中国青年运动史、中国妇女运动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

第四,专业理论、基本史料和史学史研究开始兴起。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方法和任务,早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提出了。80年代初,中国现代史学会组织了现代史学科体系专题讨论会,与会同志指出:1919年至1949年的这段历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应该是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等各种专史的综合”^①。“中国现代史的科学体系应根据1919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的实际,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做指导去探求”^②。此类专业理论问题现在已逐渐引起现代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

彭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6期。

② 王桧林:《关于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正规说是从建国开始。近年有的同志已注意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史，并发表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

标志着学科发展的专业理论、史料基础和史学史研究开始兴起，对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由初步形成教学章节体系转向开始形成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观 40 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也遇到不少挫折和失误。我们需要从反思中获得新的认识，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党的十三大的最新理论成就，对中国现代史进行再研究、再认识，争取多出成果，充分发挥中国现代史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989 年“中国现代史研究概论”讲稿，
原载《历史教学》1989 年第 10 期）

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 的对象、任务和方法

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涉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范围以及它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是探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学科自身建设和进行这一学科的研究应该首先明确的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对象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及其发展规律，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上下限也十分清楚，一般地说就是指 1919 年五四运动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①

研究对象决定研究内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要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势力如何同反革命势力进行多方面的斗争，打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摧毁旧的经济基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全过程，并揭示贯穿于这个过程的基本规律以及主要的正反面经验。为了做到这点，不仅要反映革命势力方面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活动，而且要反映反革命势力统治下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和发展包括其施政方针、措施和活动等（后者不是当陪衬处理，而是作为主要的对立面来表现）；不仅要描述政治、军

^① 也有的同志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应划至 1952 年 12 月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见《辽宁大学学报》1987 年第 1 期所载《中国革命史分期问题初探》一文。

事领域的斗争，而且要描述经济、文化、思想、社会、民族方面的斗争；不仅要阐述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还要阐述国内人民与世界人民革命的密切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考察，才能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联系和斗争讲清楚，把革命的规律、经验和教训正确地总结出来。

如果说，通常所说的中国革命史学科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话，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可说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还常常被当作“中国近代史（1840—1919）”“中国现代史（1919至现在）”的重要内涵来研究，作为“民国史（1911—1949）”的关联学科广泛涉及，或作为中共党史的扩充和延伸进行探讨。

作为革命史（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也好，中共党史、民国史、现代史也好，同属研究社会发展矛盾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同属历史学，这是它们的共性；但是革命史与中共党史、民国史、现代史又有不同。

革命史与中共党史不同。革命史侧重研究各革命阶段、阶层的政治斗争的历程；中共党史则侧重研究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发展变化的历程。

革命史与民国史不同。革命史着眼于研究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革命阶级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民国史则侧重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研究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由盛而衰以至灭亡的历史，即民国统治者的历史。当前研究民国史，主要着眼于“政权”，这是为了区别于已有的近现代史、革命史。倘把民国作为一个“时代”的称号，民国史当应以这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对象，这样民国史与现代史的研究范围除1911—1919这几年外，就很少差别了。

革命史与现代史也不同。革命史倘仅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而言属于现代政治史，是现代史专史之一；现代史则是现代政治

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的综合，它还是整个中国通史的继续和组成部分。

当然，同为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史之间又有不同。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其它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史则是无产阶级在有了自己的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社会革命、改造同经济恢复、建设结合起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段历史，如果就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对象和任务来说，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一同划入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范畴；如果就时代特点、领导阶级来说，又可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一同划入现代革命史的范畴。多年来，史学界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用法。有的同志往往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为独立学科来研究，则可不涉入此段革命史近代现代究应何属的争论。本书即是从此点出发对这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作一概述的。

由此可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纵观言，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组成部分，而就横观言，则是中国政治史的分支。它是政治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历史科学，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借鉴功能。

正因为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应该也需要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这也可说是本书特别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述略》定名的一点依据。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为了更好说明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目的和意义，应该首先认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占有的

地位和起到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有中国近现代史先由资产阶级后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称得上是具有完整意义上的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采取暴力手段又是创造了新的社会制度的一次革命。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意义深远：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广大人民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争得自己解放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对那些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国家 and 人民，都有着可贵的参考价值。

因此，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目的和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革命史的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借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经过了漫长的道路。在此之前，无数次的斗争尽管也有过胜利，但终究还是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最终能够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可能性。总结这段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刻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的真理，而且可以从党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群众工作等实践中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如此丰富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经验教训，不是当时或短期就可充分认识和深刻总结的，而从新的时代高度来重新认识和总结，仍是

参见李新：《中国革命史丛书前言》，载《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1期。